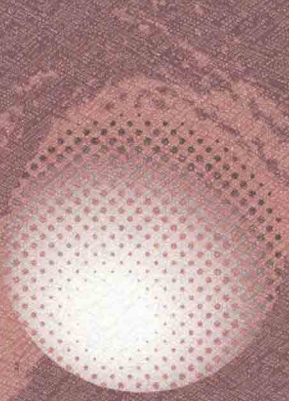


New History Salon

新史学沙龙

陈启能
王学典
姜亢
主编



民国史学的转折

——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

(1927~1937)

陈峰 著

Turn of History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Research on the Social History Controversy,
1927-1937

山东大学出版社

New History Salon

新史学沙龙

陈启能
王学典
姜瓦
主编

民国史学的转折

——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

陈峰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陈峰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12
(新史学沙龙)
ISBN 978-7-5607-4261-8

I. ①民…

II. ①陈…

III. ①社会史学—研究—中国—1927～1937

IV. ①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6518 号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250100)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20×1010 毫米(1/16)

印 张：16.75

字 数：260 千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新史学沙龙》编委会

主编

陈启能 王学典 姜 芃

顾问(以姓氏英文字母为序)

Carlos Antonio Aguirre Rojas

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墨西哥)

Jerry Bentley 杰里·本特莱(美国)

Peter Burke 彼得·伯克(英国)

Alexander Oganovich Chubarian

亚历山大·奥加诺维奇·丘巴里扬(俄国)

Brian L. Evans 布赖恩·埃文斯(加拿大)

Carlo Ginzberg 卡罗·金兹伯格(意大利)

Dirk Hoerder 狄克·霍德尔(德国)

Georg G. Iggers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美国)

Juergen Kocka 于尔根·科卡(德国)

Chris Lorenz 克里斯·洛伦兹(荷兰)

Boris Nikolaevich Mironov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

Lorina Petrovna Repina

洛里娜·彼得罗芙娜·列宾娜(俄国)

Joern Ruesen 约恩·吕森(德国)

Richard Vann 理查德·范恩(美国)

Immanuel Wallerstein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

Q. Edward Wang 王晴佳(美国)

Hayden White 海登·怀特(美国)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守和 于 沛 朱政惠 刘家和 何 平

何兆武 李幼蒸 周春生 赵轶峰 曹特金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青年项目
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资助项目
Independent Innovation Foundation
of Shandong University, IIFSDU

总 序

毋庸讳言，眼下的中国史学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这一巨变因同时构成为中国社会巨变的一部分而显得异常深刻。

事实上，这一巨变已延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只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巨变在悄然加速。巨变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个基本的方向。而此时的中国史学，却失去了度量变动的参照本身，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正不知该划向何处。

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当前的史界情势！

“历史学往何处去？”从“文革”结束后就一直是个问题。最初我们想回到前“文革”时代，很快发现不行。80年代我们急切地拥抱现代化，“反传统”，向往所谓的“西方文明”。90年代，“西方”虽未淡出，但“传统”却卷土重来，与传统互为表里的“国学”也随之复兴重光。出于对所谓“国学”的向往，90年代的知识界集体向民国学术走去。近若干年，我们的学风又在调整之中，回归考据的势头有所减弱，“西学”特别是其中的“西方汉学”或美国中国学重又抬头，乃至有成为“显学”的迹象。但“西方汉学”能成为未来史学界的稳定方向吗？回答显然无法立刻作出。

实际上，史学界仍处在摸索和徘徊之中。

史家的天职让我们懂得，巨变的时代，巨变中的史学，需要一份清楚的历史记录，或者说一份实录。这份记录或实录必须要贴近时代，要同“本土化”与“全球化”交相辉映的学术现实共脉动；要尽可能多地容纳大家对其历史去向的望闻问切，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人们特色各异和角度不同的病情诊断与症候分析；还要能引领史学走出当下的迷茫，竭尽所能地寻找中国史学前行的新航向。其中，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概括力的审视

民国史学的转折

和扫描必不可少,而基于不同审视和扫描的批评与专深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当然,第一位的,是必须要有一份对中国史学存续承继的厚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应是人们进行相关思考的起码的心理基础或共识。

我们发现,能同时体现上述追求的期刊和出版物,不是说没有,而是太过其少。对于巨变中的史学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因此,“新史学沙龙”出焉。

陈启能 王学典 姜 芃

2008年4月

话语更新、“合法性”危机的消解 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

（代序）

从20世纪90年代起,唯物史观派史学可以说遭遇到了一场自它在中国诞生以来最严峻的危机,即“合法性”危机。所谓“合法性”危机,这里主要是指这一学派存在的学术必要性遭到了最深刻的质疑,它赖以存在的学术史根据也被一块块地抽走。一段时间以来,史观派史学在现代学术史上似乎已成为一个多余的存在,乃至是一个负面的存在,或作为一个政治控制学术的反面范例。这一危机的铸成,毫无疑问,有现实原因。比如“苏东剧变”,当时在一些人看来,既然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实践上已经破产,那么它在学术实践上也不会结出好果实。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一些自封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在铸成这一危机中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部分人一直以来所“捍卫”的,恰好是那些被主流学界所抛弃、所鄙视的东西。譬如,唯物史观派史学带有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在社会革命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等等,一些学者直到前几年还在对这一点津津乐道,仿佛唯物史观派史学存在的合法性只在于它的现实功用。岂不知,这一点恰好是一些人把唯物史观派史学从现代学术史中抹去的主要依据。要知道,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的中心问题是学术史问题,在这一特定的语境中,在评估史观派史学时,主要不着眼于它的学术史意义而仅着眼于它的社会史意义,这不恰好是授人以柄吗?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唯物史观派史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换句话说,在近

民国史学的转折

百年来的学术演进或知识增长中,唯物史观派史学究竟是否提供了以及提供了那些为其他学派所没有提供的真知?

所以,对唯物史观派史学而言,直到今天,最紧迫的一个任务,依然是在整个现代学术史的视野和框架内梳理和总结自己的研究史,以为自己在当下的存在重新“立法”。这一任务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一步确认现代学术史上唯物史观派存在的知识论意义;另一方面则是恢复唯物史观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的真实面貌。

“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西方学界的主要敌人波普尔说:“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严肃的经济史”,因此,“马克思对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可以说完全扭转了先前历史学家的观念”。^②另一位西方著名历史哲学家说:“自从从马克思以来,或者不如说自从19世纪末年以来”,历史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史和社会史”,“人们日益接受……与政治因素相对而言的经济因素乃是历史变化中真正的决定因素”的“论点”。^③甚至连当年的胡适也承认:“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生路。”^④

笔者条举上述材料,首先意在指出这样一个现代学术史上的基本事实,唯物史观派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出现,既顺应了国际史学的最新潮流,又填补了乾嘉以还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空白,即“食货之学的缺略”^⑤。“食货之学”即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空白在20世纪的被填补,不能不是20世纪学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学术史事件,而这一事件的出现,应该说主要来自史观派的努力。“井田制”、“封建制”、“均田制”、

① 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② [英]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王凌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③ [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186页。

④ 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载《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

⑤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载傅杰编《自述与印象:章太炎》,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页。



“地主制”、“庄园制”、“初税亩”、“农村公社”等经济史上关键事实的发覆，不能不归功于唯物史观的指引，其中，“铁”的发现和“铁制工具”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巨大动力作用的强调，更是与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的诱导密不可分。总之，整个社会经济史研究在 20 世纪中国的兴起，完全可以视为唯物史观派的一大学术史业绩。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相关，史观派学人另一重大学术史业绩，是把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概念工具引入历史分析中来，从而把中国史学带入了社会科学化的新阶段。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这两部名著可以看作是这个新阶段到来的标志。这一研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当时就已被人揭示出来，认为这“例示”了“古史研究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既“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这本身也是“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所以，“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遵循的”。^① 从世界范围看，摆脱 19 世纪及以前的政治史、精英史模式，写“底层的历史”或“自下而上看的历史”，是历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又一特征。因此，唯物史观派史学第三个重大学术史业绩，是对“历史上的小人物”、“农民”、“奴隶”所起作用的发现，其标志就是中国农民战争史这一崭新学科的创立。正是由于这一学科的推动，使中国史学完成了从精英史到民众史的结构性质转换。

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业绩绝不止上述三端，甚至上述三端也并不那么典型，笔者在这里申述这三项业绩，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思考下面这个问题：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也即史观派和“史语所”诞生前后，“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究竟是什么？陈寅恪先生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②，而敦煌学的中心和正统在法国，“法国汉学”遂被看作是“新潮流”之所在，而“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③，则就是陈寅恪所谓的“预流”，而“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假如这一点得到确认，那么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就完全“预流”了，而史观派的上述所谓业绩当然就是“未入流”之举。问题在于，1930 年前后的“流”是什么？几乎所有的

① 素痴：《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载 1932 年 1 月 4 日《大公报》。

②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第 2 分，1930 年 6 月。

③ 顾潮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2 页。

民国史学的转折

学术史家一致认定,当时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是“社会经济史”,不是所谓的“敦煌学”,是即将诞生的法国的“年鉴学派”,而不是所谓的“巴黎汉学”,迄今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位学术史家把“敦煌学”、“法国汉学”看作是当时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者。假如我们能把社会经济史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社会科学化和自下而上的历史看作是兰克之后 20 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话,那么,史观派的学术史业绩及其深远的学术史意义就必须予以重新评估。事实上,有的学术史家早就开始了这种重新评估的尝试了。

另一个攸关唯物史观派史学“合法性”的问题是:恢复这一学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的真实面貌。提出这一问题针对的是这一现象: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叙事把现代学术史上本来是一支很雄壮很庞大的唯物史观派学术力量写得越来越单薄,直至最后只剩下有数的几个人。“学术史叙事”的“革命史化”倾向,可能是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而这一点今天看来应该纠正。

这其中,有许多具体情形未能得到恰当的处置,最主要的看来有这样两种:首先,我们未能看到,被我们的学术史叙事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敌人的一些人,也曾对“唯物史观”表示过激赏,承认过这一历史观的价值。如上面提到的胡适,他的的确确是学术界“反马克思主义”的头号人物,说过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算不得好汉”之类心存轻蔑的话,但是,他对“唯物史观”对治学的意义的认识却十分到位,用“开一个新纪元”、“开无数门径”、“开许多生路”来赞许唯物史观的影响,这种评估可以说“无以复加”。实际上,不仅胡适如此,胡适的追随者和门下也多能如此。如陈衡哲在 1924 年 5 月 28 日曾致信胡适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影响的一个人。……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①

至于胡适的弟子顾颉刚下面的这段话,就更是为学界所周知:“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至于

① 耿云志:《胡适年谱》,载其《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97 页。



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①

而胡适的其他弟子如罗尔纲、吴晗等人在30年代中期则早已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从事历史研究了。

唯物史观派学术史叙事的最大缺略,也是这一学术史叙事革命史化的最集中表现,就是将那些一度信从过唯物史观的人完全排除在外。其中有两个人可能最为典型:30年代的冯友兰和陶希圣。

冯友兰是一个被时人认为从“北伐成功”至30年代中期“近五十年中国思想之第三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这个时代“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潮”,而“这个时代思想人物可以冯芝生(友兰)、张申府、郭沫若、李达为代表”。^②当时的人这样定位冯友兰是有坚实的根据的。《中国哲学史》是冯氏的代表作,而“很能应用唯物史观”,当时就被认为是此书的首要特征。^③此后的作为所谓“贞元六书”之一的《新事论》,系统而深入地表达了冯氏对社会、历史、文化的观点,而唯物史观是他阐发这些问题的基本观念工具。这一点至今为人们所称道。而《秦汉的历史哲学》一文则表明冯氏对唯物史观的把握已达到登堂入室的程度,以至于被许为“当代学人中,最懂得唯物史观的”的人之一。^④唯物史观在冯氏几乎所有述作中都有体现。无怪乎时人这样期待冯氏:“在这‘风雨如晦’的时代中,作我们一个思想的领导者。”^⑤今天看来,冯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无疑是唯物史观派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

与冯友兰一样,陶希圣也被看作“近五十年中国思想之第三阶段”即“唯物史观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陶偏重于研究“社会经济史”,所以在这个阶段,他被看作是与郭沫若并驾齐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代表。郭湛波认为: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以郭沫若、陶希圣二氏成绩为最佳”。而“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

① 顾颉刚:《古史辨》第4册顺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下引该书,版本同此)

③ 参见张岱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载《出版周刊》第126号,1935年4月。

④ 参见曹聚仁《天一阁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

⑤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49页。

民国史学的转折

生了。”^①出版于1946年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②美国学者德里克也将陶希圣和郭沫若等量齐观。其他学术史家也都肯定了陶氏作为史观派开山的作用。

冯、陶二位都曾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并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而且把这种成就挂在“史观派”或“释古派”的帐下，也已属学界共识。问题在于，冯、陶二位都与国民党、蒋介石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与他们在学术上信奉“唯物史观”不同，他们在政治上都处在“社会革命”的对立面。所以，逐步“革命史化”的学术史叙事就将他们删除了。被这种学术史叙事所删除的绝不只他们二人。

20世纪20年代与胡适在《建设》杂志上进行井田制有无之辩论的胡汉民、廖仲恺，也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先驱者，是与李大钊一样的元老级人物。德国学者罗梅君就指出，“胡汉民对井田制的研究是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首次尝试”^③。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时期，则是唯物史观派的一统天下，是唯物史观的一次大爆炸，一次大阅兵。“新生命派”、“新思潮派”、“动力派”、“读书杂志派”等各色人物无不奉唯物史观为主臬。他们纷纷以“历史唯物论者”自命，人们亦皆以此视之。当时王礼锡就指出：“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作武器”。^④后来也有学者发现：“论战各方，即使不属于中共或托派，甚至是共产党的反对者，都大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并以这作为论证的理论依据。包括胡秋原、方亦如等人也如此。论战中各方共同使用的如‘帝国主义’、‘封建制度’、‘阶级关系’、‘商品经济’等概念、词汇也基本上属于或遵循着马

①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79页。

②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7页。

③ [德]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孙立新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④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读书杂志》第1卷4、5期合刊，1931年8月。



克思主义学说的范围。”^①承社会史论战而起、专攻社会经济史的“食货派”也应归属唯物史观派,尽管他们的具体研究路线有所不同,但基本立场未变。创立于1934年、以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员为主体的“史学研究会”,也是唯物史观派的一个分支,主要会员有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也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心。汤象龙曾有过明确的说明:“当时大家虽然谈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分析。”^②1933年的国立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学研究会(又改名“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编辑《历史科学》杂志,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有丁迪豪、郭昭文、萧桑等人。其主导思想,明显地倾向唯物史观。但较社会史论战时期已有了进步,他们表示:“我们虽也站在历史的唯物主义方面,但我们要由历史发展之本身作深入的探究,从而以为历史之判断。我们虽也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但我们要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③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老将李季、王宜昌等人仍然表现相当活跃,在学界兴风作浪,四面出击,继续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与当时的主流派展开交锋,在时人眼中的确是唯物史观派的代表。20世纪40年代,童书业在上海与马克思主义新史家展开论战,对手方正是李季、王宜昌等人。遗憾的是,他们或者由于与国民党渊源甚深,或者由于与所谓“托派”纠缠不清,上述如此庞大的群体都被日后的学术史研究者驱逐出唯物史观派的阵营。

不断缩编的唯物史观派学术队伍于是就这样与唯物史观影响下的显著的学术史事实、思想史事实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唯物史观在30年代初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④;“五四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主义……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假如‘古史辨’可以象征五四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② 《汤象龙自述》,载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③ 《创刊之辞》,载《历史科学》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

④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古史辨》第7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民国史学的转折

可以象征北伐后的新史学。”^①就像我们现在从一些学术史叙事中所看到的一样,仅仅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几个人怎能造成一种像“怒潮”一样的学术史大势呢?而删掉冯友兰、陶希圣等人的现代学术史叙事只能给人以这种疑问。这种学术史叙事与学术史事实的冲突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是:一个在现实政治立场上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社会革命的人可否同时在学术思想取向上以唯物史观为治学工具?而要想透彻回答这个问题,看来我们又不得不走向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可否分梳为作为“社会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笔者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客观上就存在着这种区分。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存在着“政治内容”与“学术内容”两个区间,在我们的研究活动中,也理应将马克思主义析分为作为“行动”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单元。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纯的革命学说和政治理论。因为马克思要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人类思想成果进行批判,所以马克思主义几乎集成了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中除了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等作为政治的内容外,还蕴含着大量丰富的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内容。譬如,经济学的内容、政治学的内容、社会学的内容、哲学的内容、历史学的内容、人类学的内容、民族学的内容等等,就是其中比较醒目的学术成分。正是以这些学术成分为依托,我们才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学科。把上述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内容统称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以与作为“行动”的马克思主义作相对的、适度的分离和切割,应该是妥当的。较之以往那种混为一谈、笼统言之的做法,显然更有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这是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点。

唯物史观派史学要彻底实现对自身的学术重塑,除了要重新梳理自己的历史,还要全面更新自己的话语系统。为什么要更新话语系统?唯物史观派史学产生于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之中,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自觉地介入了这场社会革命,所以从一开始,它就不带有纯学术的品格,它也不是一个纯学术流派。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与这场社会革命

^①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10月。



共享一套话语资源,而这套话语则是“充斥着二十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意识形态话语,也即一套展现社会革命的话语。像“封建”、“封建社会”、“阶级”、“阶级社会”、“地主”、“地主阶级”、“剥削”、“剥削制度”等等,以及与这些术语相关连的许多社会历史理念、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假设,都只有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才有意义,远非学术语言。如果“语言”、“话语”仅仅是一种“表达形式”,盛装“事实”的中性的容器和载体,那当然无足轻重,问题在于它们很可能就是历史本身。客观历史一旦消逝,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就已经变成了一种语言事实,在特定的语言之外,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历史了。也就是说,一旦人们使用了某种话语,那就进入了某种规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这时要想对历史作另一种把握,简直没有可能。使用这套话语所表达、所反映的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很容易理解,在“后社会革命时代”也可以理解,但从乡土社会进入城市社会后,尤其是到了—个远离“战争”、远离“革命”的一代已成长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后,还在使用这套话语,那就有可能被生活所淘汰。这不仅会丧失这一史学的社会影响力,还有可能会逐步丧失这一史学在变化了的学术领域的发言权。因此,更新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流话语,是重塑这一流派学术形象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不仅唯物史观派史学需要话语更新,在笔者看来,唯物史观本身、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甚至更需要话语更新。

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表述,长期以来我们有着统一的标准,似乎不可动摇,没有讨论的余地,也没有讨论的必要。其实不然。我们也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反思,尤其是批评过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不良倾向,但我们始终未能真正走出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阴云。原因就在于我们与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在同一个话语系统之中。因为我们总是在使用同一套概念语汇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所以我们一直处在怪圈之中。只有抛弃以往那套束缚我们思维的概念语汇,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彻底与教条主义、公式主义诀别。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社会科学理论,我们今天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要从当代社会科学中汲取资源,尤其是吸收其中的新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已被超越的内容不应该固守,而是要更新。比如说,我们以前通常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表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民国史学的转折

识。”这显然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决定论,而且是一元决定论。但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未忽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这种口诀式的表述虽然易懂易记,却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中强调非物质因素的一面,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曲解。现今社会科学的认识已经突破了一元决定论,以往的表述方式只能使马克思主义沦为过时的理论。我们应当用语气较弱的“制约”一词来替换“决定”一词,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弹性。再如,在社会形态学说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无完全统一的描述,我们却将“五种生产方式”学说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法则。今天,国内学术界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五种生产方式”学说是“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产物,并非人类历史的普世性法则。它取消了东方地区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在历史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其所衍生的一系列的假问题消耗着、折磨着研究者的思维。同时,“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的支配,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宏观历史进程的真知灼见,难免良莠不分,买椟还珠。

在更新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话语时,我们认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他们对阶级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过分关注概念化的阶级定位,而忽视了对阶级关系和冲突的动态的定性研究。如在对生产方式层面的阶级分析中,过分执著于复杂的阶级划分,因而使得对阶级和阶级形成过程的讨论,化约为在阶级划分问题上的斗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则调整扩充了阶级概念的内涵,强调阶级并不是一种孤立的、静态的现象,不是一种“简单的数据统计和等级阶层安排”,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和发展过程,是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和社会生活互动的“关系”。E. P. 汤姆森指出,“阶级是一种文化的和社会的形成,不能抽象、孤立地而必须按照与其它阶级的关系来给它下定义;阶级的定义最终是通过时间即行动、反应、变化和冲突的过程作出的……阶级本身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发生”^①。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对生产方式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他们不赞成传统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和技术作为生产方式基础的观点,主

^① [英]戴维·李、布赖恩·特纳主编:《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姜辉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